

视觉人类学论坛

【第1辑】

主编◎朱靖江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视觉人类学论坛

【第1辑】

主编◎朱靖江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视觉人类学论坛. 第1辑/朱靖江主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130-3425-8

I. ①视… II. ①朱… III. ①视觉—文化人类学—研究 IV. ①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0337 号

内容提要

在数字影像飞速发展的当代, 视觉人类学在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实践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记录与保护、运用影像媒体对中国文化深度表述, 以及乡村影像的文化遗产与社会赋权等领域, 视觉人类学都发挥着深远的学术影响力, 产生了积极的社会价值。本书的出版是对近两年来视觉人类学在学术研究、海外理论新知、影像民族志创作以及社区影像工作等各领域成就的一次阶段性总结。书中收纳的大部分内容, 均来自电子期刊《影视人类学论坛》所发表的文章以及第一届“视觉人类学与当代中国文化论坛”的会议论文, 亦有少量文章来自民族志作者的导演阐述和田野笔记。

责任编辑: 石红华

封面设计: 刘伟

责任校对: 韩秀天

责任出版: 刘译文

视觉人类学论坛 (第1辑)

朱靖江 主编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30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印刷: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版次: 2015年6月第1版

字数: 370千字

ISBN 978-7-5130-3425-8

网 址: <http://www.ipph.cn>

邮 编: 100088

责编邮箱: shihonghua@sina.com

发行传真: 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印 张: 21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8.00元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视觉人类学论坛编委会

鲍 江 陈学礼 郭 净
雷建军 陆文东 朱靖江

学术支持机构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影视人类学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文化人类学中心

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影视人类学实验室

云南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

本书获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学科建设经费资助

序 言

郭 净

纪录影像于 19 世纪后期传入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于 20 世纪前期在中国逐渐成形并得到初步发展。影像实践与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交织并相互影响，凌纯声、杨成志、江应樑等人是借助影像支持田野调查，庄学本、孙明经、郑君里等人则是从影像出发，涉足民族和边疆考察。而民族志影像作为一种系统的探索，则起步于 1957 年。那时，为配合全国规模的民族大调查，以国家电影制作机构和科研单位合作的方式，开始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影片”（简称民纪片）的制作。从 1957 年到 1967 年，参与者们用电影胶片摄制了 15 部纪录片，此后从 1976 年到 1981 年，又完成了 9 部纪录片，共计 21 部，121 本影片。

“文革”以后，由于思想解放运动浪潮的席卷及新技术的推动，官方意识形态已非控制公共话语的唯一力量，影像创造和传播的权利日益分解，民间团体、普罗大众和独立艺术家利用网络、小型放映会、边缘影像展及各种非正式的场合，拓展了交流和表达的空间。受到这一大环境的熏染，中国的影视人类学借助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平台，在 1982 年到 1995 年间得以逐渐成型。

然而，与纪录影像实践的勇猛精进形成反差的是，从 1995 年到今天，中国大陆的影视人类学却走得太慢，主要表现在缺少重要的研究成果，在高校和科研单位中未真正形成完整的教学、科研、典藏和展示的体系。这样的状况，反过来制约了纪录影像的发展，这一领域长期缺乏调查、批评、对话和反思的氛围，更遑论创建独特的理论和评价体系。当然，最近一两年的情况有所改观，建立教学机制的尝试正在开展，新的民族志影展和论坛在广西和北京已经出现，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也在陆续问世。而且，这些事件并不是孤立发生的，其背后，有新老人类学者和影视工作者的紧密合作与鼓动。

由北京、云南、广西学者共同策划和编撰，创办于 2013 年的电子刊物《影视人类学论坛》，以及中央民大举办的第一届“视觉人类学与当代中国文



化论坛”，展现了中国大陆学界推动影视人类学学科建设的新一轮努力。这努力是建立在日益清晰的学术思考之上的：历经数十年的起伏跌宕，我们才逐渐懂得了人类学对于纪录影像的意义。在第一期《影视人类学论坛》的序语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

“影视人类学”的核心意义不只是“影视”，还有“人类学”。后者强调一种多元文化语境下的理论观照，没有它，拍摄就难免变成攻击或杀戮。

要转换镜头的本能，将其化为对自我和对他人的深刻认识，使之充当不同人群对话的媒介，就需要摆脱单纯的观看，让听、闻、触、识等多种感官介入，拿起文字的手术刀，解剖发人深省又泛滥成灾的视觉奇观。唯有如此，中国的纪录影像才有可能在短暂的繁荣之后，走得更远，更久。

可以说，拍摄的实践和人类学的理论批评，是纪录影像赖以展翅飞翔的双翼。借助思想和行动的相互激励，影视人类学这门有趣的学科也才有未来。

2015 年元月

郭净：云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影视人类学者。

前言

视觉人类学的繁华与寂寞

朱靖江

视觉人类学 (Visual Anthropology, 又译为影视人类学) 是国际人类学体系之中方兴未艾且交叉广泛的一门分支学科。它既通过影像载体 (如影视、图片等) 记录与描述人类社会的文化变迁, 也对浩瀚丰厚的人类学视觉文化进行学术研究与理论阐释。视觉人类学从影像创作的维度, 可以追溯至近百年前的图片摄影与早期无声电影, 如美国摄影师爱德华·柯蒂斯 (Edward Shriff Curtis) 于 20 世纪初拍摄并出版的 20 卷本图文巨著《北美印第安人》(North America Indian) 及其担任导演的影片《在猎头者的领地上》(In the Land of Headhunters), 以及美国纪录片导演罗伯特·弗拉哈迪 (Robert Flaherty) 摄制的纪录电影《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但如果从学科创立的维度, 则只能上推至 1973 年的第九届芝加哥世界民族学与人类学大会, 与会者以通过宣言的方式, 宣告了这一将影像创作作为研究方法的分支学科在人类学体系当中的初步确立。

中国视觉人类学的学科建立, 更是迟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才悄然起步。1985—1986 年, 国际视觉人类学界的重要学者埃森·巴列克西 (Asen Balikci) 与蒂莫西·阿什 (Timothy Asch) 先后访华, 向中国学界介绍这门基于影视摄制的人类学新兴学科, 1988 年, 于晓刚、王清华、郝跃骏三位学者在《云南社会科学》发表名为《影视人类学的历史、现状及其理论框架》之论文, 首次将这一学科译名在中国学术界传播。1994 年, 作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会二级分会的“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的成立, 表明在官方设置的学术体系中给予了这一新兴学科一席之地。自上世纪 90 年代始, 云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中山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等高校陆续设置影视 (视觉) 人类学课程, 讲授该学科的基本理论与工作方法。

然而迄今为止, 20 多年的中国视觉人类学发展史却并不顺遂: 以视觉人



类学为主要教研领域的专门人才屈指可数，论文、专著、教材以及影像民族志等学术成果乏善可陈，课程单薄、零散，在人类学教学体系中可有可无，极为边缘化。视觉人类学在人类学的学术科研体系中更是身份尴尬：很少有重要学术刊物提供该学科的论文发表空间，在学术出版界，有一定科研水准的视觉人类学著作非常罕见，以影片形态呈现的影像民族志更是从未被纳入到学术评价系统之中，也就是说，即便某位视觉人类学者的影像民族志文本足以展现其学术功力，但是在科研主管部门的评估表中，仍然是毫无意义的闲篇或聊备一格的视频资料而已。这种在教学领域和科研领域的双重困境，极大地限制了视觉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正因如此，许多高校的视觉人类学教师尽管在名义上仍司其职，但大多已经在学术上另辟疆场，对于这门“鸡肋”式的边缘学科丧失了研究的兴趣和表达的力量。

面对这片贫瘠的学术土壤与“丢盔卸甲”的学人现状，一些仍然坚守视觉人类学阵地的学者试图通过学术合作与文化传播，推动这一学科继续发展。从2013年开始，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文化人类学中心、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云南社会科学院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云南大学视觉人类学实验室以及广西民族博物馆的学人与同道联合编辑的电子期刊《影视人类学论坛》开始发布，至今已推出六辑刊物，刊登了信息量十分丰富、学术水准亦达较高程度的论文、田野报告、文化资讯、学人访谈等文章，成为国内视觉人类学界唯一的专业学术期刊。随着电子期刊的影响力日增，《影视人类学论坛》的编委们进而希望通过组织“高概念”“多领域”的大型学术活动，重新激活视觉人类学的活力，将这一原本具有无限生机，却受制于学术评估体系而难以舒展的人类学分支，纳入到更为广阔的文化场域之中。

2014年6月21~22日，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主办，《视觉人类学论坛》各主编单位协办的“第一届视觉人类学与当代中国文化论坛”在中央民族大学开幕。正如论坛组委会发布之《会议通告》所言：“在数字影像飞速发展的当代，视觉人类学在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实践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记录与保护、运用影像媒体对中国文化深度表述，以及乡村影像的文化遗产与社会赋权等领域，视觉人类学都发挥着深远的学术影响力，产生了积极的社会价值。”

正是基于这一立场，“第一届视觉人类学与当代中国文化论坛”设立了“视觉人类学理论与方法”“视觉人类学与文化遗产保护”“视觉人类学与影像

传媒”“社区与乡村影像”四场专题研讨会，广泛邀请了来自海内外的知名人类学家、政府官员、NGO代表、媒体人士、独立制片人、社区影像作者，共同参与到这些既具理论研讨价值，又直面中国社会与文化现实的议题当中。与会者们从各自的角度切入，展开全方位的讨论与交流，达成以视觉人类学为核心的文化共鸣。与会议单元同时举办的，还有“人类学电影的内在动力”“卡瓦格博地方影像志”“田野中的人类学家”“青年行动影像计划”等人类学电影展映单元，许多参展作品，如台湾视觉人类学家胡台丽制作的《让灵魂回家》、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蔡华制作的《摩梭转山节》等，都是在大陆地区的首映。2013年入选第17届世界民族学与人类学大会影展中国《相处之道》单元的多部作品，如《克钦难民营》（李伟华，柯晓作品）、《献牲》（刘湘晨作品）等，也参加到本届论坛的展映片目之中，成为引人瞩目的观影亮点。除了人类学者们的民族志影像作品之外，云南省德钦县藏族村民此里卓玛与李卫红拍摄的《卡瓦格博》和《葡萄》等“乡村之眼”作品，更是凸显出视觉人类学所倡导的基于“主位”表达的村民社区影像，已成为当代中国最富于启发性与建设性的一种文化源流。

首届“视觉人类学与当代中国文化论坛”意在揭示这样一种学科愿景：视觉人类学作为一门将影像实践与学术研究、文化创新、媒体传播、社会教育等领域有机结合的交叉学科，不仅与日益影像化、视觉化的当代社会关联日渐紧密，也能够作为共同的交流平台，将相关领域的各方力量聚合在一起，共同探讨富于社会与文化建设意义的重要议题。

《视觉人类学论坛》之编辑与出版，即是对近两年来视觉人类学在学术研究、海外理论新知、影像民族志创作以及社区影像工作等各领域成就的一次阶段性总结。本书收纳的大部分内容，均来自电子期刊《影视人类学论坛》所发表的文章以及第一届“视觉人类学与当代中国文化论坛”的会议论文，亦有少量文章来自民族志作者的导演阐述和田野笔记。虽然这片学术土壤依然荒砾，竟也收获了近40万字的文字内容，大致勾勒出当代中国视觉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基本风貌。相信以此为出发点，视觉人类学界的同仁能够团结共进，投身于田野灵光的采摄之中，为视觉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开辟一条虽荆棘丛生，却风光壮美、视野恢弘，令同道者且行且珍惜的学术通途。

编者

2014年12月31日

目 录

【史论·学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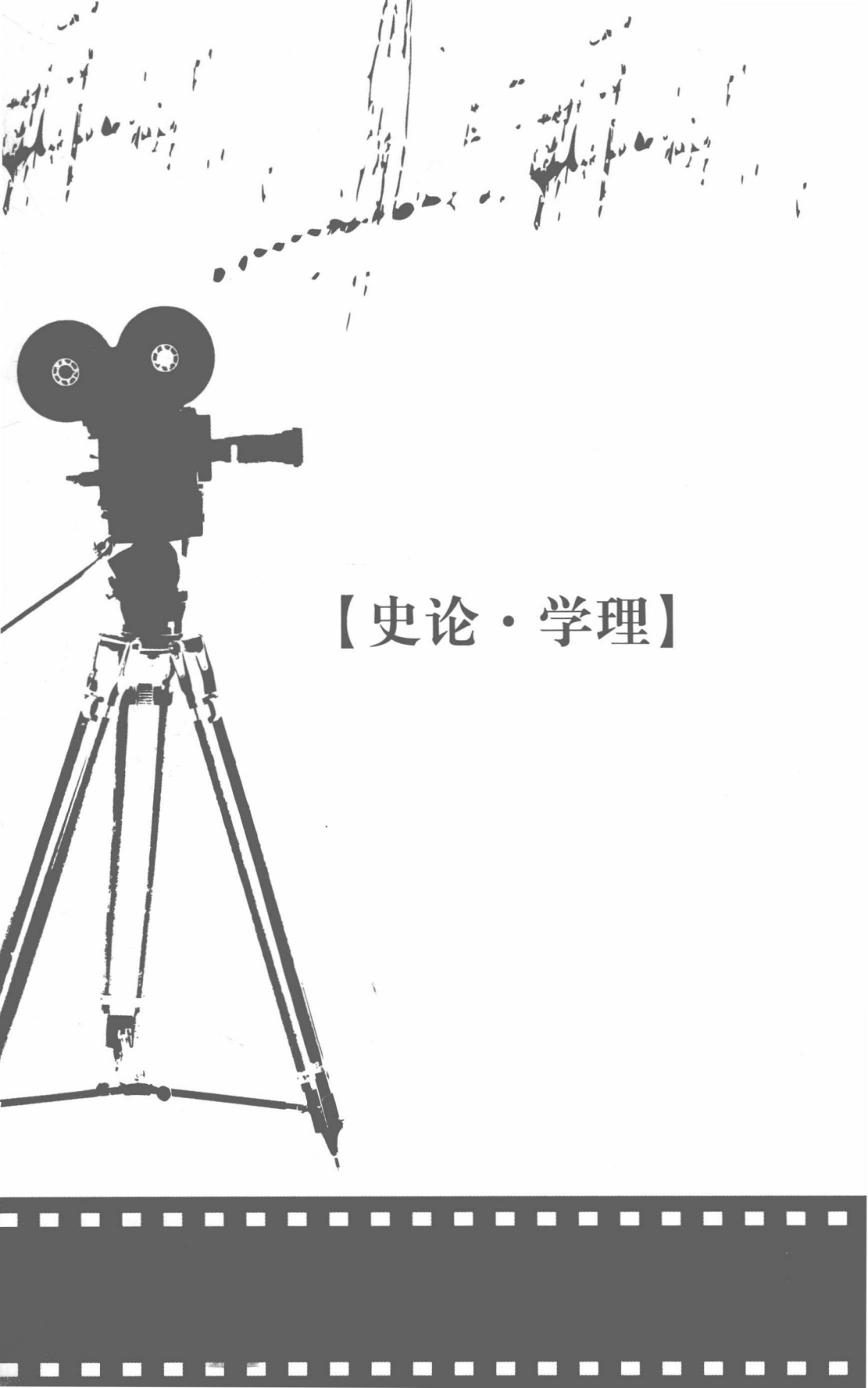
影视人类学季春	3
民族调查与电影传统	73
——“民纪片”渊源初探	
“藏边影像”：从“他者”窥视到主体表达	89
北方狩猎民族文化变迁的记录	105
——制作方式与观念对影视人类学实践的影响	
“文化中国”的想象与视觉人类学的“乡愁”	119
——以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为例	
叙事：民族志纪录片深藏的秘密？	130
卡什纳华印第安人的感知观念、视觉实践及图案艺术	
（秘鲁亚马逊区域）	148
人类学电影中的亲密性、完整性和包容性	169
电影、媒介、感觉：试论当代西方影视人类学的转向与发展	192

【田野·影志】

从观察到分享的民族志影片过程	209
——以影像解读彝族传统习惯法	
电影不同环节与文本意义的生产转移	226
——以具有人类学色彩的实验电影《翻山》为例	
民族志纪录片《让灵魂回家》摄制动机	234



纪录片的寓意性追求	238
——《献牲》创作谈	
多声道民族志电影的创作尝试及其意义	243
——以《西盟佤族木鼓考察记》为例	
社区影像在云南的实践	254
星星之火	269
——广西民族博物馆乡村影像培训与影展纪实	
当影像的直观性遭遇文化的敏感性	283
——“影像中的青少年性健康教育”项目反思	
视觉人类学中影像田野调查解析	299
风土影像田野笔记（节选）	312



【史论·学理】

影视人类学季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鲍江

季春景象，生气方盛，阳气发泄，生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

——《吕氏春秋·季春篇》

影视人类学，首先，它是人类学，而不是其他；其次，它研究人与文化，除了使用语言文字，也使用不发生语言文字意义的音像。^①

按前辈人类学家费孝通提出的人类学职志，“这门学科承担着为人类了解自身的文化、认识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及为探索不同文化之间的相处之道提供知识和见解的使命。”^②按哲学家金岳霖所谓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③、也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个词——“道”，人类学之道以“文化”为核心，有三个面向：“跨文化相处”“认识‘他者’文化”与“文化自觉”。并且，这三个面向并不孤立，而是相互联系：文化自觉以认识“他者”文化为前提，通过“他者”文化的参照反观自我，促成文化自觉；认识“他者”文化亦以

* 本文呈现了近年来我试图沟通“人类学”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开初结果，就教于方家。我最初走近胡塞尔现象学，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户晓辉启发。在此，特别向户晓辉，以及给本文提供资料支持的郭净、雷建军、陈祥军、朱靖江、许雪莲、刘湘晨、努尔巴哈提·吐尔逊、郑少雄、陈学礼、陆文东、庞涛、邓卫荣、王清华等同仁表示感谢。

① 影视人类学，对应的英文名为 Visual Anthropology，也称作“视觉人类学”“影像人类学”。本文给出的影视人类学定义，超越把它当作从事人与文化特殊领域研究学科的视阈，打开从事人与文化一般及特殊领域研究的全媒介视阈。这是我现今对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在这样的视阈里看，相比西方学界所谓“主流人类学”与“影视人类学”的门墙分隔（参见 Sarah Pink: *The Future of Visual Anthropology*, Routledge, 2006），在中国，“打通”语言文字与音像媒介的学者相对比较多，譬如庄孔韶、郭净、蔡华、朱晓阳，等等。人类学在中国自己“走出来”的这个特色，无疑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光大。就此而言，我们有两个优势条件，一方面，作为学科原发地局外人，中国人类学者拥有兼收并蓄的相对自由；另一方面，中国人类学者拥有长于综合的中文。

② 费孝通：《人类学与21世纪》，2001年7月，载费孝通《费孝通九十新语》，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167页。

③ 金岳霖：《论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6页。



自我为参照,否则认识无从谈起;跨文化相处通向认识“他者”文化与文化自觉。其中,文化自觉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具体文化传承者的自知之明,一层是超越于具体文化的、对人与文化一般关系的认识。影视人类学承担这样的学科之道,并以语言文字及音像载道、问道。

民族志是结合长时段具体田野经验与一般理论关怀、鲜明体现人类学之道的文本。^① 伴随音像媒介的价值提升,民族志获得拓展,出现彰显音像特征的民族志形式——音像民族志。^② 按太极阴阳说,音像民族志之道,即音像与语言文字的关系,一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另一方面,二者的结合形式千变万化,具有无限的可能性。

一、人类学“再现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与现象学“观自在者”(transcendental ego)及“现象学音像民族志”突破

人类学对文化的探讨,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在人与文化的关系架构下展开。概括说来,有两个路径,即“文化的人”与“人的文化”。“文化的人”,文化在先、人在后,文化造就人。在此意义上,一方面,人对文化处于习而不察的状态;另一方面,人的存在体现文化的存在,不同时空下人与人的差异,其本质是文化的差异。“人的文化”,人在先、文化在后,人创造文化,它强调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与“反思性”(reflexivity)。人类学学科史里,在这两个路径上,积淀了丰厚的文化理论学说。譬如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功能论,美国学者博厄斯及其弟子们的历史特殊论、文化相对论与民族性研究,法国学者列维·斯特劳斯科开拓的结构人类学,以及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等等,这些理论都在“文化的人”路径里展开。^③

“人的文化”路径开启得较晚,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在对“文化的人”路

① 民族志学术史述评可参考王铭铭:《远方文化的迷——民族志与实验民族志》,载《西北民族研究》,1996年第2期(总第19期),第125-139页。高丙中:《〈写文化〉与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代译序),载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 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第6-17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② 彰显音像特征的民族志,称谓不一,诸如“民族志电影”(Ethnographic Film)、“人类学电影”(Anthropological Cinema)、“影像民族志”(Visual Ethnography)、“音像民族志”(Audio-visual Ethnography)、“多媒体民族志”(Multi-media Ethnography)等。这里为了行文方便,将它们统称为“音像民族志”。

③ 可参考王铭铭主编:《西方人类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版。

径的批评中展开自身的。以我现在的认识来看,人类学学科内部“人的文化”路径的开启,其哲学根基是德国学者胡塞尔开启的现象学对实证科学的批判,其具体表现是后现代人类学思潮的兴起。按胡塞尔现象学,通过对实证科学作“现象学悬搁”(phenomenological epoché),“还原”(reduce)出知识的绝对基础——“观自在者”^①,即“自我·我思·所思”(ego, cogito, cogitatum)的“观察者”(spectator);进而由“观自在者”展开“我思”的“意向”(intentionality)“视阈”(horizon)。^②于是,实证科学的客观性还原为主体性的意向视阈。与之呼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民族志领域,以往在实证科学意义上显得无关紧要的经典民族志“周边”,一跃变成学科关注的“焦点”。民族志的权威、客观性书写背后的作者主体性、围绕民族志生产的宏观政治经济背景、人类学者与田野对象的关系、文化再现权力,等等,诸多民族志“周边问题”讨论、争鸣与反思,卷起人类学“再现危机”或称作“写文化争鸣”的浪潮。^③

学科当如何走出这场危机?以我目力所及,尚未出现能把学科带出迷津的方向性指引。乔治·E. 马库斯对人类学在美国的困顿有这样的揭示:“最关键的问题是人类学自身无力提供本学科的元话语来定义《写文化》发表以来这些变化的特质,至少在美国情况如此。相反,人类学从它参与其中的其他文献、研究计划和支持者的背景中获得最初的承认和知识上的依据。因此,在总体上人类学倾向于把其他学科关心的问题作为自己关心的问题并从中获得研究动力。”^④ 丹麦影视人类学家彼得·I. 克劳佛德(Peter Ian Crawford)这样谈及

① “观自在者”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定海神针”,即其所谓“知识的绝对基础”。打个《西游记》语境里的比方,这“观自在者”,好比元神出窍、分身化出的孙悟空:这悟空,自由自在,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这悟空,回眸一望,看见箍个金箍的孙行者,规行矩步,好比胡塞尔“实证科学化的自我”。这就是胡塞尔打开的思维空间,开阔无比。“观自在者”,英文作“transcendental ego”,直译即“超越的自我”;这里根据我理解的胡塞尔文意,结合中文里更具“传统”意味的词“观自在”,意译为“观自在者”。参见 Edmund Husserl: *The Paris Lectures*, Translated by Peter Koestenbaum, Second edition, 1975, Martinus Nijhoff, The Hague, Netherlands. 另据《笛卡尔沉思与巴黎演讲》张宪中译本译跋;英文“transcendental”德文作“transzendental”,有“先验的”“超验的”“超越的”“超越论的”等可能的译名。参见埃德蒙德·胡塞尔:《笛卡尔沉思与巴黎演讲》,张宪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0页。

② Edmund Husserl: *The Paris Lectures*, Translated by Peter Koestenbaum, Second edition, 1975, Martinus Nijhoff, The Hague, Netherlands.

③ 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 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史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④ 乔治·E. 马库斯:《〈写文化〉之后20年的美国人类学》(中文版序),龚浩群译,第8、9页,载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 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史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他作为评论员参加两场“视觉人类学的叙述转向”讨论会获得的感受：“新鲜水果蔬菜和罐装食品、啤酒、面包、奶酪和牙膏混合陈列在一起——反思性、本土性、后现代、叙事、表现、后批评、视觉认知（visual literacy）、主观方法以及照片和文字的相互影响。对于任何一个评论员来说，要涵盖所有这是不可能的。”^①新术语泛滥的热烈背后，是类似乔治·E. 马库斯谈到的，即“人类学自身找不着北”的学科状况。

“解铃还需系铃人”，危机的解决依赖于危机深层根由的发掘，而不是在浅表处修补。前文已提出我的发掘结果，人类学“再现危机”只是胡塞尔现象学对实证科学的批判延伸出来的一个具体领域。按同一逻辑，学科“转危为机”的根本路径是返回胡塞尔的现象学，从他对整个实证科学的批判脉络里寻找重新点燃人类学生机与活力的哲学支点——“观自在者”。胡塞尔通过对实证科学作“现象学悬搁”，通向“观自在者”。对于人类学而言，一方面，研究对象由客观性转向主体性有根本启发；另一方面，这里仍有未尽之意，如何在文化的限度内通向“观自在者”依然是个未决的问题。因为实证科学对于文化而言只是冰山一角，当“现象学悬搁”方法应用在文化领域，它的效应就遇到“天花板”：对某文化作“现象学悬搁”，即意味着预设了跨文化语境，其一是作为“现象学悬搁”对象的某文化，其二“对某文化作‘现象学悬搁’”本身是一种文化，即“作为文化的现象学”。换言之，“现象学悬搁”，它可以让我们直接超越“实证人类学”，直达“学理观自在者”境界，但是，它无法让我们超越“文化”，跃入“文化观自在者”境界。所谓“学理观自在者”，它能反观自身，相对化“实证科学”视阈，同时打开“现象学”视阈；所谓“文化观自在者”，它能反观自身，在“实证科学”视阈、“现象学”视阈以及其他诸多“文化”视阈（譬如“佛”“道”“儒”“东巴”“萨满”等等）之间及里外，出入自如。那么，当如何通向“文化观自在者”？问题的解决还得回到人类学自身的根基——民族志，并对民族志进行“版本升级”，升级为兼容实证人类学的“现象学民族志”。现象学民族志的终极指向是“文化观自在者”，实证人类学则由目的转变为手段。民族志指向的变化，连带的田野也跟着变化。我们可以依然遵循人类学作为实证科学的田野工作路径，观察、参与、访谈，但我们的期待不再是田野对象客观性再现的终极版本，而是

① 彼得·I. 克劳福德：《视觉人类学家在编故事——不是吗？》杨美健译，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12月，总24卷，第12期，第19页。